

回望桐城派

清康熙五十二年（1713），著名古文家桐城戴名世以大逆罪被戮于京师，举世震悼。戴名世（1653—1713），字田有，一字褐夫，号南山，又号忧庵，被祸之后，时人将他姓名隐去，称宋潜虚先生。康熙四十八年，中进士一甲二名（榜眼），授翰林院编修。戴名世是文学家，以古文创作著称于时，提出为文要“道法辞兼备，精气神合一”，为桐城派先驱。其著作主要有《南山集》，正是这部文集中的一些文字，招致他获罪殒命，后人称这次文字狱为“南山集案”。

南山集案发生在康熙五十一年。事情的经过是，戴名世授为翰林院编修后，左都御史赵申乔参劾他“妄窃文名，恃才放荡。前为诸生时，私刻文集，肆口游谈，倒置是非，语多狂悖”，斥责戴名世既然已蒙恩入翰林，仍不追悔以前的过错，将文集书板销毁。像这种狂徒怎能容许他位列高位？应严加惩处，以戒同类。皇帝见疏大为震怒，下旨严察。后经议处，交刑部审讯。康熙五十二年二月，皇帝批旨“从宽典定”，戴名世从宽免凌迟，立即处斩。

南山集案是因戴名世《南山集》语多狂悖而发。文集中哪些文字是“狂悖”之语呢？法国汉学家

戴廷杰先生在他所著《戴名世年谱》中列举了《南山集》六篇文章，分别是《与余生书》《赠许亦士序》《送释钟山序》《送刘继庄还洞庭序》《赠刘言洁序》《朱翁诗序》。戴名世在高中榜眼之前，《南山集》早已刊布，这六篇文章多为作者在命运坎坷、屡困场屋的情形下，泄心中郁结，发愤世之辞。尤其是《与余生书》一文同情偏安一隅的南明小朝廷，提及南明年号，是六篇文章中最为“悖逆”的文字。《与余生书》鲜明地表达了戴氏的史学观，即鼎革之变，前朝所延续的偏安政权，不容忽略；对明王朝迅忽灭亡予以同情。特别是肯定同乡方孝标所写的《滇黔纪闻》关于南明小朝廷史料真实性，这些都是清廷所不能容忍的。因此南山集案发生后，桐城方孝标及其家人也受到了牵连。

戴名世身为读书人，为何不一心做好制举之文，而要愤世疾俗，与时抗争呢？分析他在取得功名之前的思想轨迹，主要有三点：一是遗民情结。戴名世出生于清初，当时一批遗民思想家都心怀国破家亡之痛，眷怀前明，不事新朝，有的

还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斗争。戴名世的祖、父辈都经历了流离之苦，使他从小就生发了遗民情结。他在《忧庵记》一文中说自己“生也与忧俱，凡数十年于今矣，吾故以忧名吾庵，志其实也”，其实这种“忧”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洁情操，忧患意识在他的文集中比比皆是。二是独立精神。戴名世为学尊崇先秦诸子，尤喜左、国、史、汉、韩、柳、欧、苏之文，而遗民之痛、家世败落又培植了他睥睨世相、孤介刚直的性格。尤其是乡先辈如左光斗、方以智、潘江等人的气节，对他特立的性格形成有很大的影响。三是启蒙意识。戴名世生活的时代，政治上刚刚经历了天崩地裂、改朝换代，思想上清初一批思想家如王夫之、方以智等在反清排满斗争无望后，纷纷隐逸山林，摒除空疏学风，提倡经世之用之学。在此思潮强烈冲击下，戴名世清醒地看到清王朝在政治制度、伦理纲常、文化政策、选才标准等方面的种种弊端。因而以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觉悟，独立思考，写了大量的“有悖时宜”的文章，体现了一位古文家早期的启蒙思

想。具体体现在他竭力批判科举制度；反对空疏学风，讲求笃修，为学提倡经世之用；反对封建旧道德，同情贞妇烈女命运等方面。

南山集案发生距今已三百余年。作为一代文宗，戴名世《南山集》及其诸多诗文，为后人留下一份文学遗产；作为一位思想者，他的独立人格与坚持真理的气节，更给后来者留下了一座精神丰碑。



李国春，1958年生，桐城人。桐城地方文化研究者

回望桐城派

提起方苞，都知道他是散文家，桐城派宗师，这固然不错，但又不尽然。审视其八十余载人生，呈现六大面向，是典型的“六边形宗师”。

古文宗师。古文的源头，可追溯到《左传》《史记》，唐宋时期获得大发展。南宋以降，时文影响上升，至明代达到鼎盛。进入清代，非但时文影响不减，骈文也有铺展之势，同时小说崛起，古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古文辨体愈益迫切，“方氏起而廓清之，自是以后，异喙已息”（章太炎语），古文边界由此明晰，并有了自己独特的含义，这是方苞的重要贡献。韩茨评价：“散体文至灵皋，四书文至其兄百川，亦确然可信。”方苞所开创的古文义法，被桐城派及后世文家奉为圭臬，对于古文发展功不可没。

时文宗师。明清是中国科举的高峰时代，方苞与兄方舟，堪称清代科举时文“双璧”。《大清一统志》称方氏兄弟：“俱湛深经术，负文章重名，艺林称二方先生。”梁章巨称赞：“方灵皋则有根柢，又有词华，读之可以开拓心胸，增长笔力。”方苞一生创作时文百余篇，编选《钦定四书文》，制定官方衡文标准，成为唯一入选《四库全书》的官方时文选本。同时，他提出以古文提升时文，并倡导“清真古雅”的古文之风。此外，方苞的伟大在于，他不以时文为傲，还痛

斥时文之弊，年青时作时文实为生计所迫尔。

修书总裁。方苞在朝廷三十年，官阶虽有变化，但修书工作伴随始终。他长期担任康、雍、乾三朝武英殿和各大修书馆总裁，所修之书包括《御制历象考成》《御定音韵阐微》《御定骈字类编》《御定四库全书》等，并编选《钦定四书文》《古文约选》等。方苞所修之书，不少直接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另外，他还开创了官刻经史附校勘记与句读的先例，以及从《永乐大典》辑佚的先河，为清代殿本书真正的奠基人。

作为翰林院教习。翰林院是古代最高文化部门，集中了当时知识界精英。他们的职责所在，不管是经筵日讲、进士朝考，还是扈从出巡、殿试考官、教习庶吉士，无不彰显显赫的社会地位及尊贵的权威。方苞长期就职于翰林院，两人南书房，两次教授庶吉士，同时参与乡试会试阅卷。除了日常工作以外，方苞还积极推动翰林院教学改革，不少进士跟从方苞学习，在方苞弟子中，进士占半数以上，这无疑与其翰林院教习的身份分不开。

作为庙堂理学家。在治学之

外，方苞积极进言献策，关心百姓疾苦。从方苞传世的奏议来看，涉及五大领域：一是经济类，如《请定征收地丁银两之期札子》《请禁烧酒种烟札子》等。二是农业水利类，如《请备荒政并兼修地治札子》《论山西灾荒札子》等。三是仪礼类，如《请正孔氏家庙祀典札子》《请以汤斌从祀文庙札子》等。四是行政人事类，如《论九卿会议事宜札子》《请解除积习兴起人才札子》等。五是文化教育类，如《请定庶吉士馆课及散馆则例札子》《论考试翰林札子》等。这些奏议不少被批复实施，影响千家万户。

作为经史学者。方苞一生著述丰赡，有《抗希堂十六种》，其中《周官集注》《周官析疑》《仪礼析疑》《礼记析疑》《春秋通论》《春秋比事目录》《望溪集》被收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。全祖望评曰：“大江以南，近日老成日谢，经术文章之望，公与临川实尸之，虽高卧江乡，犹为天下之望。”曾国藩曰：“望溪先生古文辞，为国家二百余年之冠，学者久无异辞。即其经术之湛深，八股文之雄厚，亦不愧为一大儒。”内藤湖南曰：“在有关《史记》的评论中，最为精彩者是方苞。”《清史稿》曰：“苞为学宗程朱，尤究心《春秋》《三礼》，笃于

伦纪。既家居，建宗祠，定祭礼，设义田。其为文，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，务以扶道教、裨风化为任。尤严于义法，为古文正宗，号‘桐城派’。”

这就是方苞，最负天下大名，亦多谤议。自曾祖辈即移居南京，不没桐城籍。被南山集案牵连下狱，又以文名天下而获释。观其一生志行，比之汤斌、陆陇其诸公，当无愧色。较以韩愈、欧阳修之文，亦有胜处。



任雪山，南京大学文学博士，合肥大学文传学院副教授。著有《方苞年谱》《归雅：方苞与清代文坛》《桐城派文论的现代回响》等

“六边形文坛宗师”方苞

任雪山